

王焕镛 著

墨子校释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墨子校释

王 焕 镛 著

朱 渊 蔡勇飞 朱宏达 参释
水渭松 王敬之

浙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封面设计 杨 光
责任编辑 张文德
萧欣桥

墨子校释

王焕镪著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 1/32 印张13.25 插页5 字数306,000 印数00,001—10,000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317·136 定 价：2.00 元

前 言

墨子，名翟，鲁国人，生卒不详，约生活在春秋之末，战国之初。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，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。

墨子生活的这一时期，是以诸侯国之间频繁的兼并战争为其主要特征的。当时热衷于征战的诸侯，他们不惜投入庞大的人力和财力，以求达到掠夺别国的土地和人民的目的。同时，他们为了满足奢侈的享乐生活，还强迫人民承受繁重的差役和交纳沉重的赋税。这就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困苦。

墨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一个学派，他们以“为万民兴利除害”作为自己的使命，并为之孜孜奋斗。墨子本人出身于“贱人”，对于民生的疾苦，有深切的了解，其救世之心也更为迫切。他的学说思想的根本出发点，就是谋求制止战争，安定民生，安定社会。他为了宣传与贯彻自己的学说思想，不仅游说列国，而且还艰苦卓绝地身体力行。传说他“席不暖”，“突不黔”，真有孟子所说的“摩顶放踵利天下，为之”的精神。正因为如此，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，被看作是传

奇式的英雄，他的学说思想也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。

墨子的弟子有数百人之多，所谓“弟子弥丰，充满天下”。他们大多来自社会下层，也都象墨子一样，为了拯救民生，可以“赴火蹈刃，死不旋踵”。他们既能游说和出仕，又能参加实际的防御战斗。因此，墨家既是一个学派组织，又是一个武装团体。处于兴盛时期的墨家，不仅在学说思想上可以与儒家相抗衡，具有“显学”的地位，而且在军事上也是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。

综观墨子的学说思想，其中心内容是崇尚“兼”，而反对“别”。所谓“兼”，就是要视人如己；所谓“别”，就是人不关己。由此而倡导“兼爱”，要人们爱人如己，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相亲相爱，以“兼相爱”达到“交相利”的目的；反对“兼相恶、交相贼”，相互仇视和伤害。他认为行“别”道，“亏人自利”，是产生一切社会祸害的根源。因此主张“以兼易别”，“禁恶而劝爱”，以“兼相爱、交相利”去取代“兼相恶、交相贼”，只有这样，社会才能治理，民生才得安定。他认为能符合“兼相爱、交相利”这一宗旨的，就是“义”；反之，就是“不义”。他称这“义”是“天下之良宝”，是“大器”，他要尽自己的力量，将天下之人都“鼓而进于义”。

由于损人利己是当时统治者的本性，所以，墨子的“兼爱”思想不可能为他们所接受。虽然如此，墨子对于当时统治者的损人利己行为的揭露和谴责，仍具有积

极的意义。墨子的“兼爱”说，是提倡一种平等的爱，因此，它是对儒家“爱有等差”这种狭隘观念的突破，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倾向。

“非攻”与“兼爱”是完全一致的。当时疯狂进行征战的诸侯势力，无不是为了“贪伐胜之名及所得之利”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，这种兼并战争是走向统一的前奏，但它在当时，确已成为“天下之巨害”。墨子愤怒地谴责它是“亏人自利”的“不义”行为，是一种明目张胆的盗窃行径，这种看法是很深刻的。为了消弭战祸，他除了强烈谴责、奔走呼吁之外，还与他的弟子从事实际的防御战术的研究，并且亲自投入防御战斗。

墨子对国家治理方面，提出了积极的进步的主张。政治上，他主张“尚贤使能”。他说：“尚贤者，治之本。”“官无常贵，而民无终贱，有能则举之，无能则下之。”虽为王公大人的“骨肉之亲”，只要无德无才，就断然撤免，还要“贫而贱之，以为徒役”；反之，“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有能则举之，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禄，任之以事，断予之令”。不仅如此，墨子还反复强调古代各级官吏，直至天子，都是由人民选择推举产生。推举的各级官吏应该是“贤者”，天子则应该是天下最“贤良圣知辩慧之人”。对于墨子来说，“民”的概念如此明确，而不是假借民意；“尚贤”的主张如此彻底，意在当时的统治机构进行改革。这些主张远

为其他诸子所不及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，也反映了墨家参与政治管理的要求。

经济上，他主张“强本节用”，使国家和人民财用富足。这一点，为西汉的司马谈所充分肯定。司马谈在《论六家要指》中说：“要曰强本节用，则人给家足之道也。此墨子之所长，虽百家弗能也。”所谓“强本”，就是注重生产，发展经济。强本的主要措施，是让驱供战争和差役之用的农夫妇人，得以回归故里，从事耕稼树艺和纺绩织纴，弗夺其力，弗夺其时。这是当时人民最迫切的愿望，也是安定民生的根本途径。所谓“节用”，就是要统治者节制奢侈的生活享受。当时统治者的享乐生活已达到惊人的地步：生前，他们的饮食必具美味佳肴，食前方丈；穿衣必锦绣文采；居处必广建宫室园囿，尽日沈湎于声色歌舞；死后，还要倾府库之财而葬。这就势必要“厚作敛于百姓，暴夺民衣食之财”，使广大人民沦于饥寒之中，使国家财用陷于困匮。墨子鉴于“俭节则昌，淫佚则亡”的历史教训，提出要强本而节用，开源而节流，以求达到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富足。此外，他还认为，君主的费用必须以有利于实用、有利于民生为准则。凡是不利于实用、不利于民生的，一概在撤销之列。

在墨子的学说中，一个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，是他的“尊天事鬼”思想。这从表面上来看，显然是在宣扬对神权的迷信，其实不然。

所谓“尊天”，就是要顺从“天志”。什么是“天志”呢？是“爱利百姓”，“为万民兴利除害，富贫众寡，安危治乱”；是“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”；是“不欲大国之攻小国”；……十分明显，这正是墨子之“志”，正是墨子所要宣扬的“义”。墨子将自己之“志”，假借“天志”来提出，这无非是要借重天的至高权威，使它具有慑服之力，使得独裁凶顽的统治者有所顾忌，有所收敛。他说：“天子未得次（恣）己而为政，有天政（正）之”。他要把“天之正天子”的道理，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。所以，节制天子，这就是墨子提出“天志”说的直接目的。天子必须“上同”于“天志”。谁能顺从“天志”，必得天之赐福；谁违抗“天志”，难免灾祸降临。

所谓“事鬼”，就是侍奉鬼神。怎样侍奉鬼神呢？墨子说，鬼神并不是只求有祭祀之仪式，更不是贪图享受一点祭品；鬼神的愿望是“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，多财则以分贫也”，欲有利于百姓，欲人们之“兼相爱、交相利”。只有实现鬼神的这种愿望，才合“事鬼”的本意。他又说，鬼神的目光是极其敏锐的，爱憎是极其分明的，赏罚是极其迅速的。墨子力证鬼神之存在，极言鬼神之灵验，固然带有迷信的色彩；而实际上是与提出“天志”说出于同一用意，其主要目的是以此作为警戒统治者的一种武器。

既然“天志”和鬼神之“志”，都离不开“为万民

兴利除害”，那么，这种“天志”和鬼神之“志”，不也就是“民志”的曲折反映么？要统治者顺从“天志”和鬼神之“志”，不也就是顺从“民志”么？按照墨子的理想，一个国家的君主，决不是一个压迫百姓、享乐至上的统治者，人民并不是为了让他“富贵游佚而择之”；而应该是象大禹那样，是一位一心为民利而艰苦奋斗的领袖，“必先万民之身，后为其身，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”。墨子以此要求当时的“王公大人”，固然是不可能办到的，但是它却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。

墨家和儒家是尖锐对立的学派，墨子“非儒”思想正反映了儒墨争鸣的一个侧面。《淮南子·要略训》说：“墨子学儒者之业，受孔子之术，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，厚葬靡财而贫民，服丧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”这段话很有参考价值，说明墨家有可能是从儒家分化出来的。儒家学说自有其长处，但毋庸讳言，也有其严重的局限性，在发展过程中又有其流弊。儒家所主张的繁文缛礼、厚葬久丧，确已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。墨子对此进行批评，应该说是正确的。特别是对于儒家迷信“天命”的强烈谴责，更具有进步意义。墨子认为，只有依靠自己的强力从事，才能获得温饱荣贵，国家才能安宁富强。这种见解是很可贵的。至于墨子提出“非乐”，认为一切音乐都是有害的，都在“禁而止之”之列，这又显然失之偏颇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墨子的学说思想是有益于社会民生的，有利于封建制度的稳定和发展的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的。墨子的学说在当时深受人民的欢迎，有广泛的社会影响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。可是，墨学虽极盛于战国，却很快地消亡于秦汉，并且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无人理会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以为，主要原因是：第一，墨子学说既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，要迫使统治者顺从民意，这就必然遭到当时和历代统治者的厌弃和反对。墨子关于各级官吏乃至天子都要由人民选择推举的思想，关于“农与工肆之人”，因“尚贤”而可以取代原有官吏而居上位的思想，更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。墨学之所以一蹶不振，实由于此。第二，墨子“以自苦为极”的精神，虽然有时赢得人们的崇敬，却为一般人所难于接受。《庄子·天下》篇说：“墨子虽能独任，奈天下何？”就连他的后学，也难贯彻始终。第三，墨子学说遭到了儒家的激烈攻击，在将儒家思想奉为正宗的封建社会中，世人听到的是对墨家一片贬斥之声，墨家自无立足之地。直至唐代韩愈言孔墨之道本相通，两家必相用，则已是墨学沉沦千余年之后的振聋发聩之论。然而，要不是象韩愈这样的儒学大家，又有谁敢为此“异端”置一词！此后，一直至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，考据之学勃兴，方有少数学者如汪中等研治其书而深究其本，称誉墨子为“勤生薄死而务国家之事”的

“仁人”。可是，汪中当即被人诋为“墨者”。可见“墨者”已是加人以罪名的代名词。虽然如此，光绪年间的孙诒让、俞樾等，仍褒扬其“用心笃厚，勇于振世救敝”，不失为有胆识的折衷之论。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，效法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，提出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口号，并说我国古时最讲“爱”字的莫过于墨子。孙中山先生独许墨子之“爱”，正是注意到墨子的“兼爱”是一种平等意义的爱，是包括人民在内的爱，所以，是合于“博爱”的精神的。于此，亦可窥见墨子思想启示后人之一斑。

《墨子》一书，出于墨子及其弟子的著述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，有七十一篇。由于它遭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歧视和遗弃，所以传注儒家典籍之书以上千计，而《墨子》一书，历两千余年之久，竟很少有人为之传述（晋鲁胜曾为其《经》、《经说》上下篇作传，已佚）。直至清代乾、嘉年间，始有王念孙、王引之、翁方纲、毕沅、汪中、张惠言等人为之校释疏理，然已亡佚十八篇，仅存五十三篇，且脱漏错乱之处甚多。光绪年间孙诒让又集《墨子》论注之大成，撰成《墨子间诂》，更为读者打开了门径，扫除了很多障碍。从《墨子间诂》刊行至今，已近百年，注述《墨子》的论著亦已不少。各家的研究，自有其至当可取之处，但失误与存疑之处，亦不在少数，读者在阅读上仍存在不少困难。

我至晚年，才致力于研治《墨子》，诵读间每有所得，似觉可继各家之后有所补正，于是撰为《墨子集诂》一书，并择其要而成《墨子校释商兑》。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志想为读者提供一种《墨子》的通俗读本，为此相商于我，我欣然承诺。随即邀集朱渊、蔡勇飞、朱宏达、水渭松、王敬之五位同志商议其事，遂据《集诂》、《商兑》而作《墨子校释》，时历一年而初成此稿。其中谬误之处定为不少，殷切期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《墨子》中《经》、《经说》上下篇，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，是墨子及其弟子对于逻辑学、数学、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，它们在世界学术史上也应享有较高的地位；《备城门》以下十一篇，是研究防御战术的文献。由于它们所涉及的内容比较专门，篇幅也甚多，所以本书从略。

王焕镛

一九八二年三月于杭州大学

关于校释体例的说明

- 一、本书正文，采用孙诒让所校订之毕沅注本。
- 二、各篇次序，除《辞过》篇改定为《节用下》篇，移正于《节用中》篇之后外，全按原序不变。
- 三、凡所据旧本，不一一列其名称，概称“旧本”。
- 四、凡采用诸家之说，或列举某家之言以资参考，通于引述之末标明“（某说）”。
- 五、凡文字脱漏错乱较多之篇章，为便于读者，将校正之文附录于该篇章注释之后。
- 六、凡需校移之字句和段落，通于移正之处加以注释，误植处从略。
- 七、本书虽名为“校释”，但既为通俗读本，故务求简明，力避考证性文字。有关校释之论据，详见《墨子集诂》、《墨子校释商兑》。

本书引用与参考各家书目

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

（所引用惠栋、卢文昭、江声、段玉裁、邵晋涵、王念孙、孙星衍、洪颐煊、王引之、顾广圻、苏时学、俞樾、戴望诸家之说，皆转引于此书。）

王闿运《墨子注》

吴汝纶《墨子点勘》

吴闿生《墨子笺》

曹耀湘《墨子笺》

王景羲《墨商》

姚永概《慎宜轩笔记》

王树枏《墨子三家校注补正》

孙人和《墨子辨疑》

刘师培《墨子拾补》

陈汉章《墨子间诂》批校

陶鸿庆《读墨子札记》

尹桐阳《墨子新释》

李 笠《墨子间诂校补》

张纯一《墨子集解》《墨子间诂笺》

刘 昶《续墨子间诂》
于省吾《双剑谿诸子新证》
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
高 亨《诸子新笺》
蒋礼鸿《墨子间诂述略》
李渔叔《墨子今注今译》

内 容 提 要

《墨子》一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及其弟子的著述，因年代久远，传抄讹误，脱漏错乱之处较多；现经著者校释疏理，豁然晓畅，成为一部比较好读的《墨子》读本。《墨子》原为七十一篇，现存五十三篇，本书校释三十六篇，墨家政治伦理学说俱在其中。本书可供大专院校文科师生、社会科学工作人员、中学教师、理论干部，以及爱好先秦诸子的读者阅读参考。

目 录

亲士	1
修身	10
所染	15
法仪	22
七患	27
三辩	36
尚贤 ^上	40
尚贤 ^中	47
尚贤 ^下	64
尚同 ^上	75
尚同 ^中	81
尚同 ^下	93
兼爱 ^上	104
兼爱 ^中	107
兼爱 ^下	116
非攻 ^上	133
非攻 ^中	136
非攻 ^下	147
节用 ^上	165